

問題認知類型與傳播行爲之關聯性研究

以香港「九七」問題爲例

王嵩音*

《本文節要》

本研究的理論架構爲古努力 (James Grunig) 的處境理論 (*situ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該理論假設個人對問題及問題限制的認知程度會形成四種不同的認知類形：拘束型、樂觀型、悲觀型、常規型。四種類型將表現出不同的傳播行爲。本研究以香港「九七」問題爲例，針對493位香港居民進行電話訪問調查，以區別分析 (*discriminant analysis*) 統計方法印證了認知類型與傳播行爲之間的關聯性。結果發現樂觀型與拘束型表現出積極的傳播行爲，尤其是在蒐集「九七」有關訊息、大陸民運消息以及其他政治消息方面。在人際傳播方面，樂觀型與拘束型與他人討論九七問題的機會較悲觀型及常規型多。悲觀型亦是四類型之中最少閱讀報紙者。

此外，本研究也試圖將結果與過去在八三、八五年作的類似研究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常規型和拘束型人數比例逐年減少；樂觀型的比例則持續增加，悲觀型的比例起伏不大。其中尤以樂觀型的差異最顯著。這可以解釋爲愈來愈多的香港居民認知到九七問題的重要，而其政治意識也有增高的趨勢。

本研究建議四個認知類型分類的測量需要更詳細的設計，尤其在對問題限制的認知測量方面。未來研究也應針對各類不同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分類，如此將更能預測人們在不同處境下的認知與傳播行爲。

* 王嵩音爲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

作者欲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系主任朱立博士之協助以及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新聞研究所 Dr. Erwin Atwood 提供資料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將古努力 (James Grunig) 的處境理論 (situ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應用於政治傳播行爲。處境理論主張個人的認知，行爲及態度是隨著不同處境而變異。而個人面對一個處境的態度或認知，及他解決問題的能力交互作用，形成四種不同的傳播行爲：(一) 樂觀型 (problem facing behavior type)，(二) 拘束型 (constrain behavior type)，(三) 常規型 (routine behavior type)，(四) 悲觀型 (fatalistic behavior type)。換言之，問題取向是處境理論的重要因素，問題的認知及問題限制的認知決定個人所屬的類型，並形成某種的傳播行爲。

美國及香港兩位傳播學者艾爾文及鄭惠和 (Atwood and Cheng) 曾於一九八三年首次將處境理論應用在香港的問題上來研究 (包括有房屋問題、失業問題、香港前途問題等)。其後他們又做了兩個類似的調查研究，其中包括一九八五年特別針對香港前途問題所做的調查。

本研究基本上參照艾、鄭兩位的調查再增加了測量受訪者留意那一類的訊息。過去的研究之中，對訊息搜集行爲祇限於測量受訪者留意消息的頻率 (Frequency of attention)，卻並未將消息的類別明確劃分。

此外，筆者欲將研究結果以與往所做之結果做比較。過去針對九七問題分別有八三年二月、五月，八五年一月等三份研究。其間八四年中 (共) 英雙方簽訂了「聯合聲明」，此為九七問題的一個高峰期。而在八九年震駭全世界的「六四事件」則將香港居民帶入另一個危機時刻，相信在不同的時期，香港居民對問題的認知及搜集訊息的行爲必然有所差異。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分析更加充實處境理論並加強理論的應用性。

貳、文獻探討

一、處境理論簡介

古努力在一九八三年正式發表處境理論的完整架構。他以為個人的認知，行爲及態度是隨著不同的處境而改變，而處境理論正是用來瞭解傳播行爲何時及如何產生，以及何時可以影響認知、態度和行爲？

處境理論中重要之變項如下：

(一) 問題的認知 (Problem Recognition)

古努力對此概念所下的定義為：個人認為身處於不明朗的情況之中，或是對現況發生困擾時，導致個人須終止平常的行為，重新考慮如何應付新的環境。此種轉變的過程，即形成了問題的認知 (Grunig, 一九七六)。個人的傳播行為便由是否承認於困境之中決定。

這個現象被另一學者艾德斯坦 (Alex S. Edelstein) 稱為問題取向的行為 (problem-oriented Behavior)。兩者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

過去有關問題認知的測量，是由受訪者自行提出心目中最重要問題。例如：在艾爾文與鄭惠和針對香港的居民所作的調查中，是讓受訪者自己提出當地最顯著的問題 (Atwood & Cheng, 一九八三)，艾德斯坦在一個針對南斯拉夫和美國的跨國文化研究中，也是讓受訪者提出心目中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本研究主要針對的是「九七」的問題，所以問題的認知，是以受訪者認為「九七」是否對香港構成問題及其重要程度來測量。

(二) 問題限制的認知 (Constrain Recognition)

與問題的認知同為自變項者為問題限制的認知。在面對問題的時候，由於個別差異，有些人承認問題的存在，但卻積極尋求有關訊息，雖不一定完全解決問題，卻可減少內心的困惑。有些人則認為力量有限，也不欲正視問題的解決，根據古努力的理論，限制可分為環境與個人的因素。客觀的環境因素指自然環境、機構規範和行為準則、社會習俗和價值觀以及政治制度等。而主觀的限制則來自於個人的經濟資源、心理特徵、智力和教育程度 (Grunig, 一九六九)。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限制」可指那些左右決策者行使意志力的因素。政治學上的「政治效力感」(political efficacy) 即為衡量個人認知上限制的一項指標。個人政治效力愈高，顯示個人認為可以影響政策的能力愈大，亦即在心理上感受的限制愈小。艾、鄭二人在測量認知上的限制時，便使用了政治效力感。他們用三個效力感的項目來測量：(一) 評估自己對政府決策是否具有影響力；(二) 個人參與香港政府選舉投票是否有意義；(三) 政府是否對財團和富商特別優惠 (Atwood and Cheng, 一九八三)。本研究也以政治效力感來測量限制的認知。不過，在構成政治效力感的項目上稍作變動。為了更契合本研究所針對的「九七」問題，上述三項中之第三項由受訪者評估香港居民對於香港前途是否有影響力取而代之。

(三) 問題的關切性 (Level of Involvement)

古努力在進行處境理論測試時，發現只用問題及限制的認知兩個變項不能完全解釋傳播行為。問題的關切性是一個可能影響傳播行為的干涉變項。他將之定義為：個人認為與問題的關連程度，或個人對問題的投入程度。此變項最大的特點在於不但可以預測

個人何時發生傳播，更可解釋如何傳播——是採取主動的搜集訊息，或是在不經意中接受訊息（Grunig，一九八九；一九八三；Grunig and Disbron，一九七七）。

在其他文獻中，也有學者述及此一概念，但是使用不同的名稱。例如問題的顯著性（salience）（Atkin, Galloway and Nayman, 一九七六），或稱為相關性（relevance）（Guerrero, 一九六九；Brown, 一九七〇）。總之，問題對個人的重要程度愈高，則此問題對個人的相關程度亦愈高。

（四）傳播行爲

古努力在研究變項的傳播行爲方面，著重在於從那些消息來源接觸與問題有關的訊息之程度。例如：早期他在探討哥倫比亞農民接觸訊息的來源時，粗分為七類：（一）報紙、（二）電台的農民節目、（三）農業雜誌、（四）穀物協會等的權威消息來源、（五）商業消息、（六）同業、（七）私人接觸。此外，他還探測訊息對處理問題的有效程度。後來，古努力在有關環境問題的調查，祇是詢問受訪者是否曾主動索取有關問題的小冊子，當做衡量他們尋找訊息的程度。在本研究中，傳播行爲係針對受訪的香港居民對「九七」有關訊息的留意程度。

（五）認知類型的傳播行爲

現簡述前言提及的四個認知類型如下：

（一）樂觀型：個人雖然處於困境之中，卻不認為受到限制，而可自由作出選擇，以解決或處理問題（對問題的認知高，對問題限制的認知低）。

（二）拘束型：個人感到問題的存在。卻認為對問題的解決無能為力，處處受到客觀環境的限制（對問題及問題限制兩者的認知皆偏高）。

（三）悲觀型：個人並不受困境所困擾，卻也認為對任何問題皆無影響力，也無法改善處境（對問題的認知低，對問題限制的認知高）。

（四）常規型：個人的行爲十分規律，既不感覺到問題的存在，也沒有任何選擇，因此行爲與慣例無異（對問題及問題限制兩者的認知皆低）。

（六）四種認知類型的傳播行爲

依據古努力的理論及實證研究結果，樂觀型的民衆在四個類型中常常是最主動、積極接觸傳播媒介以搜集有關訊息。樂觀型者承認有問題存在，同時自認有能力憑個人意志，選擇積極的解決問題途徑。所以，在決策的過程中，傳播行爲不僅顯示在尋求訊息，也顯示在頻繁的人際溝通上。

與樂觀型形成兩個極端的則為悲觀型的人。他們對周遭的一切抱持著宿命的態度，既不主動尋求訊息，甚且採取逃避的態度。所以此型屬於最不活躍的一個類型。

常規型與悲觀型皆由於對問題的認知低，而無強烈的資訊需求。常規型不認為有問題的存在，一切皆依著習慣性的方式使用媒介及處理資訊。

最後，拘束型的受眾較常規型與悲觀型稍積極尋求資訊。但是由於此類型人自認能力有限而無法克服困境，所以對訊息的需求程度較樂觀型低。

(七) 問題關切性對認知類型的傳播行為之影響

根據古努力的假設，認為問題關切性高的類型（即對個人有切身影響），較傾向主動的訊息尋求；而那些認為問題關切性低的類型，則只是被動的接受訊息，並且漫不經心地處理這些訊息。所以，作為干涉變項的問題關切性，影響四個類型的受眾增加對訊息的需求，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

本研究採電話訪問方式，以香港地區住宅電話簿刊載的用戶中年滿十八歲以上者為研究對象。抽樣方式為分層比例系統抽樣法。分層是以構成香港的三個地區為依據，按總體比例決定樣本中三地之人數（港島、九龍、新界）。電話簿之抽樣則以系統抽樣抽取受訪戶。在每一戶中再使用隨機表挑選出受訪者。原定樣本數為五百，實際完成有效問卷資料四百九十七份。訪問調查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月三日之間晚間進行。

二、樣本檢定

本研究採用 Z 測驗方法來檢查樣本與母體間在性別及年齡的百分比上是否有差異。其中男、女性的樣本百分比與母體間無顯著差異，所以樣本在性別上具代表性。至於年齡的 Z 測驗結果顯示二十歲至三十歲以及四十一歲至五十歲的樣本比例均與母體無顯著差異，但是在三十一歲至四十歲，五十一歲至六十歲及六十歲以上則有顯著差異，因而較不具代表性。可能的解釋為一方面訪員未能確實使用隨機取樣，另一方面香港中年以上者不識字比例多，容易拒絕受訪。詳細百分比參見表一。

表一 樣本與母體差異的檢定

變 項	樣 本 (百分比)	母 體 (百分比)	z 分數 測 試
性 別			
男	50.5	51.4	不顯著
女	49.5	48.6	不顯著
年 齡			
18~20	13.8	--	
21~30	31.2	31.5	不顯著
31~40	28.8	24.4	顯 著
41~50	12.0	13.5	不顯著
51~60	6.6	13.9	顯 著
61歲以上	7.5	16.7	顯 著

三、問卷設計

(一) 問題認知型態

對問題的認知是由以下問題測量：「你認為九七問題對香港來講有多重要？」答案則依 Likert Scale 分為「不重要」、「無意見」、「重要」、「很重要」四種。

對限制的認知是由三個「政治效力感」題目來測量：

- (1) 你同不同意香港人有能力影響香港前途？
- (2) 你同不同意參加投票選舉浪費時間？
- (3) 你同不同意像你一樣的一般人對政府的政策沒有影響力？

答案則是五個尺度的同意量表從「很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到很同意」。計分方式是答「很不同意」者得一分，逐尺度增加到答「很同意」得五分。第二題及第三題與第一題相反計分。如此得分愈高，表示政治效力感愈高。

接著將三項得分加總，求得中數 (median) 為10，並以此為基準劃分為高效力感及低效力感兩組人，效力感高者為對限制認知低者，而效力感低者則為對限制認知高者。

(二) 傳播行為

傳播行為在本研究中包括了「對九七有關訊息的注意程度」、「一般消息的注意程度」，「一般使用媒體情形」，及「人際的傳播」。

「九七有關訊息的注意程度」有下列三項：

- (1) 平日你是否留意有關「九七」的消息？
- (2) 平日你是否留意有關「大陸民運」的消息？
- (3) 平日你是否留意有關「移民」的消息？

「一般消息的注意程度」則有下列二項：

- (1) 平日你是否留意其他政治消息？
- (2) 平日你是否留意娛樂新聞呢？

答案為四個量尺的量表從不留意、很少留意、偶爾留意到常常留意。

一般使用媒介情形則包括了報紙、電視新聞以及電台新聞使用的頻率。此外「人際傳播」是以詢問受訪者是否曾在過去兩個禮拜同他人討論九七的問題來測量。

四、變項效度檢定

本研使用「因素分析」檢驗三項「政治效力感」的題目。結果顯示三項測量均歸類於一個因素。故而可以確定他們具有效度。(見表二、三)

表二 政治效力感三道題目相關矩陣

	1	2	3
(1)香港人有能力 影響香港前途	---		
(2)參加投票非浪 費時間	.28 (p=.000)	---	
(3)個人對政府政 策有影響力	.19 (p=.000)	.25 (p=.000)	---

表三 政治效力感量表因素分析表

	因素負荷量
(1)香港人有能力 影響香港前途	.70
(2)參加投票非浪 費時間	.75
(3)個人對政府政 策有影響力	.66
特 徵 值	1.49
變 異 量	49.6%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取區別分析 (discriminant analysis) 的統計方法分析資料。區別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以一系列預測變項 (predicator variables) 來區分組別。尋找出一個預測變項的線性組合 (linear combination) 可以使得組與組間差異為最大是區別分析重要的作用。

區別分析所要區分的組別是自然產生，而非受到像實驗法中人為操縱下的產品。故而此法頗適合於一般非實驗的社會調查研究。

它的重要名詞有下列幾項：

(一) 分類的正確性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每一組內分子是否皆能清楚得被預測變項所區分？各組能被區分的正確度有所不同，端賴所選擇之變項預測的能力強弱。

(二) 區別函數 (discriminant functions)

預測變項可以形成幾個有意義的層面 (dimension) 去區別組別。區別分析將最能區分組別的預測變項集合在第一個函數，其次為第二個函數，直到所有的函數皆被評估

其價值為止。函數與函數之間是不相關的。而函數的數目通常是較組數少一。換言之，若在研究中有四組，那麼區別函數最多有三個，但是並非三個函數皆有意義 (significant) 的預測組別。有意義與否通常由Wilks Lambda來測試，此外，每一函數能有效預測組別的情形也不同。譬如說，第一個函數也許可區別第一組和第三組，而第二個函數可區別第二組與第四組。

區別分析結果顯示有意義的變項將再以變異量分析 (ANOVA) 以及卡方分析詳細了解其在組間的差異情形。

肆、資料分析與解釋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基本資料中人口變項包括有：性別、年齡、收入、婚姻狀況及教育狀況。

受訪者之中，男性有二百四十九位 (50.5%)，女性二百四十四位 (49.5%)。此與人口統計資料的比例相差甚微，故具代表性。年齡方面，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之間的人數最多，計有八十四人 (17%)，其次為三十六歲至四十歲者有八十三人 (16.8%)，十八歲至二十歲者有六十八人 (13.8%)，三十一歲至三十五歲者有七十人 (14.2%)，三十六歲至四十歲者有五十九人 (12%)，四十歲至五十歲有二十六人 (5.3%)，五十一歲至五十五歲有十七人 (3.4%)，五十六歲至六十歲有十六人 (3.2%)，六十一歲以上者有三十七人 (7.5%)。

收入方面，三千元港幣以下者有一百一十五人 (23.3%)，二千元至四千元者有七十人 (14.2%)，四千至六千元者較多有一百二十六人 (25.6%)，六千元至八千元者有五十四位 (11.0%)，八千元至一萬元者有 (8.7%)，一萬元至一萬二千元者有二十人 (4.1%)，一萬二千元以上者有三十三人 (5.7%)。

在教育程度方面，最多數者受過中五 (相當於台灣的高中) 的教育，計有一百九十四人 (39.4%)。其次為中三 (國中)，計有九十四人，佔19.1%，然後是小學程度 (七十九人，16.0%)，大專以上程度則有五十三人，佔 (10.8%)，職業學校程度者則有四十三人 (8.5%)，佔比例最少者為未受教育者 (三十人，6.1%)。

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者有二百一十五人 (43.9%)，而未婚者有二百七十人 (55.1%)，「其他」為五人 (1.0%)。此與人口統計資料無大差距。

平均而言，受訪者中居住在香港的時間為二十七.八年，其中以居住三十年者最多

，有五十三人（10.8%）。

二、區別分析結果及解釋

經過以問題認知的程度與對限制認知的程度決定的四組人數分別為：拘束型（constrained），92人，樂觀型（problem facer），147人，悲觀型（fatal），117人，常規型（routine），131人。共有十四項預測變數參與區別分析（包括五項對九七有關訊息及一般消息的注意程度，三項媒介使用情形，四項人口變項，人際傳播，以及問題的關切性）。除去了缺失值後實際各組人數修正為85,141,101,119人。

結果出現了三個區別函數（見表四）。總卡方值154.40。除去第一個函數後，第二個函數的卡方值則未達顯著水準。所以結果的解釋將以第一個函數為依據。第一個函數涵蓋了七項變數，佔了78.7%的組間變異量（between-group variance）。這個數主要區別了悲觀型及常規型與樂觀型及拘束型之間的差異。

進一步使用薛費式多重比較法，來檢視四種問題認知類型中，那兩組之間在四項傳播行為上有顯著差異。結果發現樂觀型與拘束型分別與悲觀型和常規型在留意九七消息以及留意大陸民運消息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悲觀型與樂觀型，以及悲觀型與拘束型在留意其他政治消息和閱讀報紙的頻率上有顯著的差異。換言之，悲觀型比其他類型表現出較消極的傳播行為。悲觀型亦是四種類型中教育程度較低者（見表五）。這符合理論上教育與政治效力感成正相關的情形。

此外，以卡方分析四種類型在問題關切性和人際傳播的差異情形。結果顯示在拘束型與樂觀型中有九成左右認為九七對他們個人非常重要，而在悲觀型及常規型中則僅過半認為是重要的。有較多比例的拘束型及樂觀型在過去兩個禮拜曾同他人討論九七的問題。（見表六）。

最後要檢定的是分類的正確性。經過分類步驟顯示在四百四十六分析樣本中，百分之四十七點五被正確的分類。各別類型中，樂觀型是分類正確度最高的一組（73.8%），而拘束型是分類正確度最低的一組（20.0%），悲觀型有43.6%，而常規型有41.2%被正確的分類。

表四 區別分析結果——變項之負荷量與F值

變 項	函數一	函數二	函數三	F 值	顯著度
問題關切性	<u>.72</u>	.06	.05	24.11	.0000
留意九七消息	<u>.56</u>	-.17	-.00	14.87	.0000
教育程度	<u>.55</u>	.29	.00	14.64	.0000
留意政治消息	<u>.50</u>	-.38	-.13	12.79	.0000
留意大陸民運消息	<u>.45</u>	.35	.28	10.64	.0000
閱讀報紙頻率	<u>.35</u>	-.27	.06	6.44	.0003
人際傳播	<u>-.25</u>	.17	-.00	3.12	.0259
性 別	-.03	<u>.34</u>	-.26	1.32	.2683
年 齡	-.26	<u>.31</u>	.19	4.16	.0063
留意娛樂消息	.00	<u>.23</u>	.06	0.65	.5832
收 入	.17	<u>.21</u>	.19	1.79	.1481
收聽電台新聞	.18	-.05	<u>.50</u>	1.31	.2702
留意移民的消息	.29	-.14	<u>.39</u>	4.77	.0027
收看電視新聞	.06	-.27	<u>.36</u>	2.51	.0578
特 徵 值		.3122	.0594	.025	
變 異 量		78.72%	14.97%	6.31%	
χ^2 平方值		154.402	35.932	10.777	
		(P=.0000)	(P=.0929)	(P=0.5482)	

表五 區別變項在四類型的平均值

變 平 認 均 知 項 值 類 型	1.拘束型 (N=85)	2.樂觀型 (N=141)	3.悲觀型 (N=101)	4.常規型 (N=119)	薛費式多重 比 較
留意九七消息	3.49 SD=0.65	3.45 SD=0.60	2.87 SD=0.97	3.07 SD=0.90	1、3,1、4 2、3,2、4
留意政治消息	3.14 SD=0.87	3.06 SD=0.79	2.44 SD=0.93	2.80 SD=1.00	1、3,2、3
留意大陸民運消息	3.50 SD=0.72	3.52 SD=0.64	3.14 SD=0.90	3.05 SD=0.92	1、3,1、4 2、3,2、4
閱讀報紙頻率	3.27 SD=0.96	3.15 SD=0.89	2.70 SD=1.08	2.96 SD=0.98	1、3,2、3

表六 區別變項在四類型的比例

變 項	類目	拘束型	樂觀型	悲觀型	常規型	卡方檢定
問題關切性	低	10.9%	9.5%	45.3%	37.4%	$\chi^2=63.39$
	高	89.1%	90.5%	54.7%	62.6%	P=.0000
是否同他人討 論九七問題?	是	40.2%	38.8%	23.0%	30.0%	$\chi^2=10.13$
	否	59.8%	61.2%	70.0%	70.0%	P=.0174

三、跨年代之比較

在進行比較之前，必須先了解「九七」問題的歷史發展。追溯自一九七九年，港督麥里浩從鄧小平處得知中共將收回香港之後，急急通知英國於八〇年通過「英國國籍法」的修訂，這件事被形容為將「九七」問題從「平靜期」帶入「敏感期」（鍾蕙玲，一九八三）。

八二年，中共與英國開始談判九七大限問題，兩年間即會談達二十二次。北京先後放出「收回主權」、「一國兩制」、「設立特區」、「保持繁榮」及「港人治港」等承諾。有關「九七」的訊息也開始出現各個傳播媒體。一個在八二年底所作的報紙內容分析（Atwood, Cheng, 1982）顯示四份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一份左派，一份右派，二份中間）不約而同的皆強調「九七」問題的經濟層面，亦即如何維持九七後香港的經濟繁榮。以數量而言，當時有關「九七」的新聞、評論及讀者投書的總數不算多（平均一天低於一篇）。而同年所作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僅有不到一成（6.3%）的香港居民非常留意「九七」問題。這些發現的涵義可以解釋為港人對於中共不收回香港還存有一些樂觀的態度。而在一九八三年九月發生的經濟風暴（港元股票暴跌，市民搶購日用品）又反映出港人的拒共心態。

八四年九月，中（共）英草簽「聯合聲明」，則使得「九七」問題進入一個關鍵期。當時，吸引了廣大居民的注意力。十多萬本政府印製的聲明內容在數小時內被市民一掃而空。聲明中勾劃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即維持香港資本主義的體制，五十年不變。對無港人參與的這份協議，港人即使不滿意也只能接受。香港前途就此邁入一個新的階段。學者則認為九七的問題促使香港急速政治化（金耀基，一九八八）。向來香港普遍瀰漫著政治冷漠的氣息。其原因有三：港人的政治避難背景，「經濟掛帥」的社會取向及無政黨和非選舉的政府。為了落實聯合聲明中所標示九七後「港人治港」的精神，八五年港英先後舉行了區議會和立法局的選舉作為代議制的基礎；同時，中共為了制定「基本法」，先後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這些均激發了港人參政的興趣。

八九年大陸民主運動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六四事件。全球華人中尤以香港人的反應最為激烈。有百多萬港人上街遊行表達對中共的憤怒及對民運份子的支援。本調查發現有半數的（49.6%）受訪者曾經參加支持大陸民運的活動（遊行、簽名、捐款等）。當時，港人對香港政治前途的信心驟然跌至谷底。根據香港市場研究社（SRH, Survey Re-

search Hong Kong) 所作定期信心水準調查資料顯示，以一九八五年一月作為一百點的基點，八七年、八八年平均維持在九十五點左右，六四事件時低至八十點，之後便一直未提昇。移民潮也因此遽增了三倍（「南華早報」，一九九〇年五月四日）。

隨著九七問題的發展，香港居民在對問題的認知及態度上的差異可由四次不同時期調查的結果窺知一二。但是因為不同研究在操作定義上有些差異，不能以統計方法比較（見表七）。

從各認知類型的人數來看，拘束型人數比例在八三年之間遽增，隨後則逐步減少；樂觀型的比例則持續增加；悲觀型的比例起伏不大；常規型的比例在第一次調查時最大，隨後則有減少的趨勢。綜觀四次調查結果，以第一次和第四次在人數比例上差異最大，尤其以樂觀型的差異最為顯著，這可以解釋為一方面愈來愈多的香港居民認知到九七問題的重要，另一方面港人的政治意識（政治效力感）也有增高的情形產生。再者，從對問題的關切性亦可發現類似的變化。四次調查中對問題關切高的比例以八九年最高；換言之，有愈來愈多的港人認為九七問題對其個人很重要。

另外，從認知類型與問題關切性的交叉分析結果也發現了不同年代調查間之差異。四次調查均以拘束型與樂觀型在問題關切性高的比例居多數，其中尤其八九年之調查特別顯著。至於悲觀者及常規者則出現不一致的現象。兩類型在八三年五月的調查中，對問題關切性低的比例均高於對問題關切性高的比例。但是其他三個調查則發現相反的結果。

上述之比較結果雖無統計的證實，但是從比例上之變化可以觀察到香港居民愈來愈能界定九七問題，對問題的關切性也愈來愈強。

伍、結論與檢討

本研究再次證明古努力的處境理論頗適合於研究不同的處境對個人在認知及行為上之差異。四種認知類型的分類使得吾人更能瞭解影響傳播行為的因素。現將重要的發現分述如下：

一、最具有預測能力的變項中，多數為傳播行為，人口變項則僅有教育程度具有足夠預測能力。悲觀型的教育程度最低，而樂觀型的教育程度最高，這與艾爾文等所作研究的結果一樣。所以教育程度愈高者即使在困境中，也會盡量尋求解決的辦法，而不會自怨自艾，一籌莫展。

二、傳播行為中以九七有關訊息的注意程度較能區分四種類型。如假設所期望，樂

表七 四個時期認知類型人數及問題關切性交叉分析比較

問題關切性	八三年二月			八三年五月			八五年一月			八九年十一月		
	低	高	總數	低	高	總數	低	高	總數	低	高	總數
拘束型人	數 24	37	61	66	110	176	61	102	163	10	82	92
	百分比39.3	60.7	11.8	37.5	62.5	34.9	37.4	62.6	37.9	10.9	89.1	18.9
樂觀型人	數 27	32	59	27	69	96	35	80	115	14	133	147
	百分比45.8	54.2	11.4	27.1	71.9	19.0	42.6	57.4	32.2	9.5	90.5	30.2
悲觀型人	數 48	138	186	108	28	136	80	108	188	53	64	117
	百分比25.8	74.2	36.0	79.4	20.6	27.0	42.6	57.4	32.2	45.3	54.7	24.0
常規型人	數 86	124	210	62	34	96	45	73	118	49	82	131
	百分比41.0	59.0	40.8	64.4	35.4	19.0	38.1	61.9	20.2	37.4	62.6	26.9
總和人	數 85	331	516	263	241	504	221	363	584	126	361	487
	百分比35.9	64.1	100.0	52.2	47.8	100.0	37.8	62.2	100.0	25.9	74.1	100.0

$$\chi^2=13.38, P<0.05 \quad \chi^2=83.8, P<0.01 \quad \chi^2=4.47, P<0.05 \quad \chi^2=63.39, P<0.001$$

* 註：前三次調查結果取材於Irwin Atwood & Philip Cheng, "Public Opinion and Mass Media Use in Hong Kong," Center for Hong Kong Studies, CUHK, 1986。

觀型表現出最積極搜集資訊的態度，而悲觀型與常規型則最被動。在各類訊息中，尤以九七有關訊息、大陸民運消息，其他的政治消息最吸引受訪者的注意力。顯然，樂觀型認為這類的訊息能讓他們掌握客觀、外在的環境以尋求解除困境的辦法。此項結果亦證明了將消息的類別明確劃分的確較具效度。

三、在一般的傳播行為中，樂觀型與拘束型顯著地較悲觀型常閱讀報紙，這和以往研究的結果一致。樂觀型和拘束型或許認為報紙的內容最能提供他們有用的訊息。往後的研究應可再進一步探討各類訊息與媒介之間的相關。另外，拿四種類型作比較發現拘束型及樂觀型與他人討論九七問題的機會較悲觀型及常規型多。教育程度較高的樂觀型人是否較容易成為意見領袖也值得深究。

四、從分類的結果發現，屬於極端的樂觀型和悲觀型較為明顯，而拘束型和常規型則較模糊。可能原因是對四個類型的定義不夠完整，本研究雖稍微修改了政治效力感的測量，但似乎效果不大。效度檢定中三項測量所佔的變異量僅百分之五十，可知還需再修正。

五、本研究與過去三個研究作比較的結果發現，隨著九七問題的發展，香港居民愈加領略到該問題對整個地區乃至個人及家庭的重要性。這一方面與九七年的逼近有關，另一方面和六四事件的發生也有密切的關係。結果中亦發現樂觀型和拘束型在問題的關切性上較其他二型穩定，這顯示對於四個認知類型分類的測量需要更詳細的設計。

最後，跨文化的研究證實了處境理論的普遍性。但是人們所面對的問題本身將影響到尋求訊息的型態。有的處境可以直接由傳媒獲得有用訊息以解決疑難，有的處境則無法從傳媒得到實質的幫助。未來應可針對不同的問題環境進行研究，而能對各種問題做一分類，並考慮到媒介的結構或內容上的因素。如此將更能預測人們在不同處境下的認知與行為。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金耀基：《中國人的三個政治》。遠見叢書。民七十七，第一五六頁至一八〇頁。

鍾蕙玲：「港中文報章如何報導重要政治問題的民意—『一九九七』民意報導的個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學士論文，一九八三年。

英文部份：

- Atkin, C.K., Galloway, J., and Nayman, O.B., "New Media Exposure,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Campaign Interest", Journalism Quarterly 53: 231-237, 1976.
- Atwood, L.E., "Problem Perception and Mass Media Use in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May, 1984.
- Atwood, L.E. and Cheng P., "Public Opinion and Mass Media Use in Hong Kong", Center for Hong Kong Studies, CUHK, 1986.
- Brown, M., "Communic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ism Quarterly 47:725-734, 1970.
- Edelstein, A.S., The Uses of Communic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ugoslav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1974.
- Edelsteink A.S., "A Problem-Oriented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6:97-117, 1981.
- Grunig, J.E.,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ism Quarterly 46:565-575, 1969.
- Grunig, J.E., "AQ Multi-Systems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9-136, 1975.
- Grunig, J.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Occurring in Decision and Nondecision Situations". Journalism Quarterly 53:252-263, 286, 1976.
- Grunig, J.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s: Two Studies", Journalism Monographs, March, 1983.
- Grunig, J.E., and Stamm, K.R., "Cognitive Strategies and the Res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A Second Study", Journalism Quarterly 56:714-726, 1979.
- Querrero, J.L., "Avoidance, Relevance and Exposure to Discrepant Information", Journalism Monographs, December, 1969.

